

认清日本军事介入南海问题的动机

□ 梅秀庭

2017年5月至6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多次与美国海军在南海地区进行联合巡航训练，并于6月9日至10日，在南海地区参加日美澳加四国联合巡航训练。这些行动不仅说明南海已被日美同盟纳入其行动范围之中，而且也表明日本在为参加所谓南海“航行自由行动”作准备。

从当前南海问题相对稳定的态势和中日关系的适度回暖等因素来看，军事介入南海问题并不能给日本带来直接而显著的战略收益，反而可能使日本陷入与中国对立的境地，落得一个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恶名，尤其是在日本政府希望改变自身邻国外交被动局面的背景下。那么，日本又为何要谋求以所谓自卫队参与南海“航行自由”的方式深度介入与己并不相干的南海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动机。

其一，破坏乃至恶化中国周边环境，企图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和平发展。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正逐步从地区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如此迅速地发展，日本感到不安。自此之后，由于中日撞船事件和日本政府非法“国有化”钓鱼岛，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导致两国在东海问题上均面临相当的战略压力和舆论压力，这也成为日本将所谓防卫重心转向西南方向的不二借口。为了缓解自身在钓鱼岛的压力，更是为了分散中国在东海方向上的战略聚力，日本不惜以破坏中日关系为代价介入南海问题，向菲律宾等国出口武器装备，开展联合军事演习，鼓动它们与中国进行对抗。更甚的是，

日本谋求军事介入南海问题，意欲派遣自卫队“巡逻”南海，使南海局势趋于复杂化，其部分战略意图就在于破坏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牵制中国发展。

其二，企图提升在南海地区的存在感，增强自身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这是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要动力，也是它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目标。二战结束后，通过商品输出和对外投资等方式，日本重新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并长期保持对东南亚国家的较强影响力。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阶段后，日本逐渐显露出对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主导意识，并企图通过区域整合的方式掌握主导权。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政治大国”目标后，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政治和战略的谋划上。由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阶段，其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战略经营的势头越来越缺乏有力支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朝着越来越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整体影响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日本看来，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挑战了日本在东亚地区原有的优势地位，南海问题若没有日本的介入，势必冲淡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其影响力也将随之东流。因此，日本通过联合军演、武器出口、打击海盗、误导舆论等方式，刻意加强自身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不难看出，介入地区乃至国际安全事务，已成为日本对外谋

求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其三，以“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为借口，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将南海作为活动舞台，推动实现其“正常国家”的既定目标。这是日本谋求军事介入南海问题的实质，也是长期以来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根本动力。成为“正常国家”一直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国家战略目标，它的本质是摆脱战后体制。在现有条件不足的情势下，日本采取目标分割的方式，一步步制造“正常国家”的既成事实，而“正常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在军事上实现“自由向海外派兵”的能力。谋求派遣自卫队介入南海问题也因此成为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目标的重要支点。日本政府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南海形势事关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有必要确保南海海上航行自由”。然而，南海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并没有被打破过，也没有影响到日本所谓“海上生命线”的安全和其能源进口。为了打开“自由向海外派兵”的“潘多拉盒子”，造成自卫队“正常”走向全球，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充当美国战略部署的“马前卒”，走在美国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最前线，成为美国盟友中最反对中国的国家。与此同时，以“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为借口，通过在国内外长期渲染“中国威胁论”，为军事介入南海问题做足了舆论准备。我们应当看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勃兴和右倾化的加速，与日本苦苦追求的“正常国家”目标在日本的对外行为中逐渐找到了统一点。这既是日本政府长期对国内舆论进行错误引导的结果，也是日本不断介入南海问题的国内动力。

目前来看，如果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的叠加，日本在实现自身战略目

标、配合美国战略部署与其国内政治形势、舆论压力之间的博弈仍将持续，尤其是在安倍内阁支持率不断探底的情况下，日本短期内是否派遣自卫队公然进行所谓“南海巡航”仍不明朗。至于近期在南海地区进行的联合巡航训练，日本政府并未公开承认这一行动是“航行自由行动”。当前，我们无法排除日本参加美军所谓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可能性，同时也应考虑到，日本亦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是其军舰在前往印度洋执行任务的途中或返回日本的途中，途经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甚或12海里内，借此行为公开对外宣示巡航。

对此，中国势必采取强烈反制措施。针对日本谋求军事介入南海问题，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日本自卫队并不仅仅是像其宣传的那样“专守防卫”，而是早已活跃于东海、南海甚至印度洋。按照日本国内学者的认识，自卫队即便在南海采取“巡逻”行动，也属正常，并不需要依据“新安保法”的实施。日本的根本战略意图始终在于摆脱战后体制以成为“正常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只是其实现“正常国家”目标的一步棋。而一旦日本正式派遣自卫队进行“南海巡航”并予以公开，势必破坏南海地区正在形成的稳定局面，也将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仅要积极谋划应对日本可能军事介入南海问题的有效对策，而且要未雨绸缪，及早思考如何应对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如何与可能实现“正常国家”目标的日本打交道。这不仅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未来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某种程度上也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

国际政治

7月10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该国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宣布历时9个月的收复战取得最终胜利。无可否认，这是具有标志性的胜利。摩苏尔曾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占据的最大城市，也是其进行一系列恐怖活动指挥的“大本营”。这将极大地激励国际社会反恐的决心和士气。

然而，“失地”的收复并不意味着反恐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一方面，“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还占据着相当广阔的地区，实力依旧不容小觑；叙伊边境仍然在极端组织的掌控之中，恐怖分子依旧可以“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即便“伊斯兰国”实力大减，但恐怖组织及其追随者仍然存在。“伊斯兰国”将演变成何种形态？今后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是否会有变化？这些问题都对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构成新的挑战。

恐怖组织形态或将转化

事实上，在反恐战争中，战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对恐怖主义的有效遏制。通常情况下，恐怖组织多以游击、散落的形态分布在某一特定地区，现实组织架构较为松散。然而“伊斯兰国”是少有的将“点”连接成“线”，又将“线”扩展为“面”，在广阔领域建立起自身所谓“政权”的恐怖组织。因此，对于“伊斯兰国”的清剿更趋向于传统战争的作战方式。收复摩苏尔固然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但这在打击地区恐怖主义的征程中只是重要的一步。当传统战争的作战方式将所谓“伊斯兰国”削弱为一般恐怖组织“游击”“散落”的形态时，新的危机将接踵而至。

战场上对于恐怖组织现实组织架构的打击是有效的，但对于其有生力量的削弱相对有限。残存的恐怖分子将谋求建立更加松散、隐蔽、机动乃至虚拟化的新架构网络，以规避未来进一步的打击。日趋先进的网络社交平台为恐怖分子在虚拟空间重建组织架构提供了便利。在国际反恐力量的强大压制下，部分恐怖分子在其传统活动区域行动的游击性将增强；而另一部分，特别是跨境“圣战者”，或在各自恐怖组织的安排下回归母国，以“独狼”或者恐怖组织分支团体的形式开展恐怖活动。这将对国际安全形势造成两个极为严峻的后果：其一，恐怖组织架构分散化、虚拟化，打击难度飙升；其二，恐怖主义从热点地区加速向全球外溢，并以难以侦测的“独狼”及“小团体恐怖袭击”为新的主要发动形式，增加各国情报部门防范的难度。

“混战”令“反恐”成为空谈

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至今，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特别是沙姆地区的武装冲突长时间处于“混战”状态。其一，武装派别彼此间的合作与对立频繁变化。以叙利亚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为例：受到不同地区、教派、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派别分化多达几十支；尽管都宣称反对巴沙尔政府，但相互之间的利益诉求并不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相去甚远。其二，“敌人的敌人并非盟友”成为地区常态。在通常意义上，两个具有共同目标的武装组织容易在战场上达成合作，但中东混战的特殊性令这一“铁律”失灵。最为典型的就是“伊斯兰国”及其追随组织坚定地反对巴沙尔政府，但如若其他反叙利亚政府的国家或组织因一时战术需要，对极端组织采取绥靖甚至是合作态度，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受到“混战”中以上两点特征的影响，各武装派别常随意地以“民主”“自由”“宗教”“反恐”等政治口号来描绘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但与此同时，频繁“改换门庭”的例子亦不胜枚举。政治口号“廉价化”成为中东政治生态的普遍现象。各个国家和组织可随意地向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其他国家和组织扣上“恐怖主义”或者“支持恐怖主义”的帽子；而面对真正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组织及行为，却可能因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短期战术目标而采取绥靖乃至暗中支持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反恐合作”自然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 李子昕

摩苏尔之后，反恐仍前路漫漫

标本兼治防范恐怖主义死灰复燃

摩苏尔及其他所有从恐怖组织手中解放出来的城市，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困难重重的战后重建。在战后的废墟中，如何迅速填补地区管理的权力真空、促进难民返乡、尽快恢复基础设施及经济社会重建，都考验着地区各国政府的智慧以及国际社会反恐努力的决心。恐怖主义的滋生通常依赖于极端思想的传播、旧有体制的不公以及经济发展的滞后。因此，为防范恐怖主义死灰复燃，重建的过程不仅是单方面的物质投入，更要注重其中去极端化教育的普及、新政权组建的包容性、增加就业减少社会矛盾等议题。否则，投入再多的物质援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在新的社会矛盾激化下，恐怖分子将获得新的号召力，重新组建恐怖组织，令地区安全稳定陷入恶性循环。

此外，国际社会要严防高压下的跨国“圣战者”回流母国。各国应完善反恐法制建设，情报机构加强彼此合作。对长时间滞留抑或是频繁出入恐怖主义活跃地区的人员，各国相关部门应在法律许可的范畴内加强监察，特别是对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高危人群”加强管控，避免其回归母国后发动“独狼式”恐怖袭击。

针对中东地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一方面应完善有效地难民收容机制；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在反恐战争中得以解放地区的支持力度。难民收容是当前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面对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伸出必要的援助之手是道义责任之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边境管控的放松；相反，要特别注意防范恐怖分子借难民之名向域外扩散。“难民”并非“移民”，在战事缓和后促进流离失所的难民平安返乡，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尽快重建家园，切实有效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重回正轨，才是巩固反恐战争成果的最佳良方。

热点透析

石墨烯：重塑全球能源的未来

□ 惠春琳

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深刻调整，供求关系总体缓和，应对气候变化进入新阶段。作为改变全球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选择，新能源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新一轮能源革命蓬勃兴起，能源国际竞争焦点将从传统的资源掌控权、战略通道控制权向转型变革主导权等扩展，这必将催生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科技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新能源紧密相关的新材料产业，比如石墨烯产业，既是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和先导，也势必会对全球科技、能源、环境等各个领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石墨烯的基本特点

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薄最轻最强的新型纳米材料，能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资源能源、生物医药等80多个领域，因此被称为“黑金”，并享有“新材料之王”的美誉。有科学家预言，石墨烯将“彻底改变21世纪”，极有可能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颠覆性新技术新产业革命。

石墨烯是最薄最轻的新型“超级材料”。其厚度是一张A4纸厚度的十万分之一，头发丝的五十万分之一，重量比空气还轻。铅笔在纸上轻轻划过，留下的痕迹就可能是几层到几十层石墨烯，厚1毫米的石墨大约包含300万层石墨烯。石墨烯是人类已知的强度最高的材料，强度是普通钢材的100倍。此外，石墨烯还具有良好的韧性，单位面积石墨烯片可承受4kg重量，其韧性相当于碳纤维的20倍，不易断裂。例如，如果物理学家们能制取出厚度相当于普通食品塑料包装袋的（厚度约100纳米）石墨烯包装袋，那么它将能承受大约两吨重的物品。石墨烯的导热导电性能高、

透光性强，是室温下最好的导热材料，导热性能是碳纳米管的151倍，是铜的13倍，银的10倍。它也是室温下最好的导电材料，电子在石墨烯中的运动速度达1000千米/秒，是光速的1/300。

近两年，我国先后建立了4个石墨烯产业创新基地，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实地考察石墨烯产业化情况。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16—2021年中国石墨烯行业深度市场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申请的石墨烯专利数量最多，已超过2200项，占全世界的1/3。在政策方面，2015年以来，我国已经在《关于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多个重要文件中提及石墨烯发展目标，2016年国家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第23章中，国家也明确了石墨烯在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重要性，石墨烯作为高端材料进入到“十三五”产品目录。

石墨烯对全球未来能源结构的影响

能源与环境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工业时代都以世界能源革命和新的主导型能源机制的引入为基础和标志。新一轮能源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全球化、低碳化、智能化，其间伴随着旧世界秩序的解体和新世界秩序的重构。这将决定哪些国家最终能赢得未来百年的战略发展主动权。传统化石能源的来源、通道将不再是各国博弈的重点，争夺能源领域科技创新的技术制高点将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内容，石墨烯等新材料技术的应用将是重塑全球能源未来的关键。

突破可再生能源发展瓶颈的关键。石墨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首先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

等）的有效利用。《BP世界能源展望（2017版）》于2017年3月在中国发布。该报告对全球能源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到2035年全球能源消费将增长约30%。可再生能源增长最快，将在未来20年内翻两番，尽管如此，化石燃料在2035年仍是全球能源供应主要来源（77%）。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将不超过20%，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再生能源的储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大规模储能技术的引入将有效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其发电的入网效率。而石墨烯因理论上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优良的导电性、力学性能好的特点而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超级电容器（一种高效的储能装置）电极材料。目前，国内以及日本、韩国、英国有很多学者对石墨烯进行研究 and 修饰，石墨烯+超级电容器有望在新能源利用方面取代传统电容器，实现其在智能电网储能系统，能量传输系统，风能、光伏发电能量储存系统，分布式发电储能系统等方面的应用，提高能量存储效率，减少传输过程中的能量损失，减少能源消费中的浪费。有专家预测，石墨烯在能源领域的使用，将有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预计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占比将达到30%左右。

石油的间接“替代品”。石墨烯的使用不但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例，还可以成为石油的间接“替代品”。一是可以制成石墨烯燃油添加剂，使纳米级的石墨烯片层在燃烧室内高温高压的作用下，迅速附着并渗透至金属气缸表面，在短时间形成“油膜”，提升气缸压力。初步应用表明，在不改变油品的前提下，实际节油率达25%以上，减排力度达50%以上。二是可以将石墨烯与锂离子电池相结合，使其成为新能源汽车的理想、高效电源。电动汽车要求储能装

备不但具有高能量密度，还要具有高安全性、环境友好性、快速充电等特性。石墨烯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被视为一种优良的导电剂。添加了10%的石墨烯锂离子电池，其充放电性能均优于添加其他材料的电池。研究成果表明，石墨烯聚合材料电池的储电量是目前市场最好产品的三倍。用此电池提供电力的电动汽车能行驶超过1000公里，充电时间大大减少，充电次数可达3000次以上，电池的重量不足传统充电电池的一半。虽然目前这些数据还仅仅是处于实验室阶段，但为新能源汽车的大力发展和普及提供了可能。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石墨烯技术应用仍有几项重大困难（比如，工艺上看来，如何批量化地制备大面积、稳定性好、高质量的石墨烯就是一大难题）；产业更新成本巨大，难以简单取代现有设备。除技术与成本外，石墨烯产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在于没有形成完整的、成熟的产业链上下游。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6—2021年中国石墨烯行业深度市场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石墨烯产业仍处于中游专利布局阶段，下游产业链尚未形成，即处于产业化初期，没有完全实现石墨烯的规模化应用，对石墨烯产品最大的需求市场仍然是科研院校和少量生产厂商，仍然是以初级低端应用为主。石墨烯研发制备企业和下游应用企业脱节。由于下游需求未起，大部分石墨烯企业目前仍无法找到稳定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石墨烯作为“替代材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